

【名家背影】

□吕家乡

想起语言学家殷焕先教授(1913-1994),映入我脑海的首先是他那拥挤凌乱的书房兼卧室。

1981年春节,殷先生和我们都已走出了错划“右派”的逆境,我跟朱其铠学长一块去给殷先生拜年,看到的情景使我们大吃一惊。已是九点多钟,殷先生仍然和衣蜷卧在床上。说“蜷卧”,因为他的床上摆满了书籍、刊物和文稿,仅仅在外侧留出了一个新月形空处,弦长不过一米多点,不能翻身也不能伸腿。殷先生似乎在熟睡,又似乎在闭目运思。睁开眼,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学生,他很激动。要沏茶,好容易找到一把紫砂茶壶,壶嘴残破,壶盖是另配的。拿起暖水瓶来,竟是空的。我们请他不要麻烦。他拿出烟卷来招待我们,是廉价的“骆驼牌”。地板上到处堆放着书刊,有散放的,也有捆扎着的。我们自动找到两个小凳坐下,互诉别情。听我们说到几个同学的通信地址,他要记下来,拿起一支铅笔头,是用一根细绳拴在床头上的。告辞出门,我说:殷先生连个书桌也没有,难道就伏在床上写作吗?朱其铠答非所问地说:殷先生的住室,别人看来乱七八糟,他自己心中有数,要找什么资料一伸手心中能找到。我俩都流出了眼泪。记得我在山大上学时曾到殷先生家去过,那时师母尚未卧病,孩子们还小,住室并不拥挤和凌乱。后来的凌乱以及殷先生在凌乱中的恬然自适,大概是逆境岁月的造就吧?于是我和朱其铠不约而同地想到殷先生在1957年反右中的经历,谈到他为什么被划为“右派”,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回想起当年对殷先生的印象。我于1949年暑假后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那时青岛解放不久,政治空气很浓,殷先生却经常拿着一摞厚厚的语音调查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按照方言一一读给他听,他细心地用字母标下读音,似乎窗外的锣鼓和欢呼对他的语音研究毫无影响。我当时不知道这有怎样的作用,只觉得这老师很“迂”。他给我们开的课是《古代汉语》,当时很不受重视,

【文化杂谈】

□刘亚伟

近来社会上吁求共识的声音多起来,我以为这起码说明,现在终于来到了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的入口处,同时也标志着对分歧、异见存在的某种承认或默认。我乐观地认为,也许从此分歧、异见和多元化会获得更多存在空间。

在传统的专制或威权社会,是不需要共识的,需要的只是树立和捍卫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需要造成社会成员对统治权威的绝对服从,然后就可以用“圣上明断”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继而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了。这种传统权威的塑造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运用暴力,强制社会成员服从一定的价值观念;二是制造神话,通过讲故事,使统治者神圣化、偶像化。可以说,由社会共识替代对传统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性的标志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与胡适、陈独秀由于思想见解不同,三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自是常事。一次,胡适发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说:《努力》杂志一年多来的许多文章都不及“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作文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

殷焕先先生

殷先生如此反省他在1957年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成分,他在追求怎样的更高人生境界呢?他在写墨竹的诗中有一句是“从容不迫自惊人”,也许这是他理想人格的写照吧?

听者起先十几人,后来只剩了五六人,半学期后干脆停开了。殷先生并不在意,见了学生总是笑咪咪的。他经常穿大褂,有时也穿西服,总是显出安详从容、恬然自适的样子。政治活动中他不出头露面,全系的联欢会上也不出节目。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甚至吞吞吐吐,走路慢慢腾腾,似乎怕踩死蚂蚁。同学们都认为他属于“重业务,轻政治”(那时还没有“只专不红”的说法)的旧知识分子,因此我们所编的校刊副刊《新文学》,从来也不向他约稿。这样柔弱怯懦的殷先生怎么会向鸣放中爆发出政治热情,怎么会向党“进攻”呢?

在这个春节期间,我和别的老同学见面时也不由得谈起殷先生。G君谈了他听到的传闻:殷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能不贯彻九三学社某些负责人的“右派路线”吗?听说本来问题不怎么严重,可是殷先生态度不好,脾气太倔了,所以越闹越升级。G君还告诉我另一件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几年前,殷先生在“破帽遮颜过闹市”的逆境中,硬是打赢了一场官司。有一位名流侵犯了他和家人的人身权利,他毅然挺身向法院提出控告,果然胜诉。这让我想起当年鲁迅向法院起诉高官名流的做法,真有些轰轰烈烈的感觉。我开始发觉以前对殷先生的印象大错了。他绝不是一味柔弱,而是外柔内倔,不,岂止是倔,简直是铮铮铁骨!

由此我又想到殷先生对吕荧先生的态度。1951年秋,山大搞了一场批判中文系主任吕荧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不大不小的运动。我原先是吕荧先生的支持者,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转变了态度,写了批判文章。吕荧先生拒绝检讨,愤而辞职离校。殷先生跟吕荧从小就是同学和朋友,在运动中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1954年,我已毕业工作,暑假重访母校,在校园里遇见殷先生,他邀我到校门外的东方商场喝啤酒、吃煎包,问我是否和吕荧先生有联系,我说没有。他说:“吕荧先生对你是很器重的。”殷先生似乎把那一场批判吕荧的运动全忘了。

梁漱溟：我没有敌人

关于理性话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

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的一线曙光!”梁漱溟对此深有感触:“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这令我很难过。”

晚年,梁漱溟对儿子谈起这桩往事,感叹之余,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他认为这是必须首先辨明的问题。

梁漱溟认为:“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我不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同时,梁漱溟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能成功”。

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

曾参加一次博友聚会,谈起某位网上名人的言论,席间有人很气愤,说这种人就该骂;有人不同意开骂,说骂他等于刺激他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人反驳,那种人渣你还期望他会转变……桌上的人分成两拨争论

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党,把殷先生的这些言行都看作是“划不清是非界限”的糊涂落后表现。听了G君的叙述,我才感到殷先生不参与批判吕荧,并不是糊涂,而是一种清醒又倔强的坚守。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后,殷先生在学术上焕发了青春,新著接连问世,学术地位也更加提高,担任了全省和全国语言学会的要职,身体和精神面貌也让人刮目相看。他以七十多岁高龄,毅然做了胃切除手术。起死回生后,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遇见老同学Y君,他兴奋地告诉我:殷先生入党了。在审批过程中,有的党员不同意,说他动机不纯,反右前他没有申请,改正后申请是为了“争口气”。这意见是提到支部,支部还是通过了;后来又提到党委,党委还是批准了。这次和Y君交谈,还了解到殷先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具体情况。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两句话:“乌云遮了太阳,鲜花不能开放。”这是别人替他概括的。他在一次鸣放座谈会上说:有的积极分子为了表示向党靠拢,常向党组织汇报别人的情况,有些汇报并不实事求是,妨碍了党群关系,说得严重点,好比乌云遮住了太阳。他还说:毛主席号召除毒草、浇鲜花,非常英明,但首先要细心分辨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不然就会把鲜花当毒草除掉,鲜花怎么能开放?反右斗争开始后,殷先生的这些意见被简化成那两句顺口溜,硬说殷先生把共产党污蔑为乌云、把国民党美化为太阳、把胡风分子说成鲜花。殷先生不服。他所说有时汇报不够实事求是的积极分子是指同事Z先生。本来他和Z先生关系不错,平时也向Z先生谈过这个意见。他希望Z先生出来作证,可是在那种政治气氛下,Z先生怎能为他辩护呢?殷先生很气愤,又说了些不冷静的话,被定为“右派”分子,由教授降为教员。从此他和Z先生断绝了朋友关系。入党后就和Z先生在一个支部,虽然没有恢复友谊,却保持着正常的同志关系。

1993年盛夏,在一次气功健身报告会上,我遇见了殷先生,座

位距离很近。他已骨瘦如柴,背也很驼,拿着一把竹篾编制的扇子。他听讲时全神贯注,有时还在小本本上做记录。散会后,他坐在会场外的水泥地上,摇着扇子,等候他的儿子来接他。我蹲着跟他闲谈,问他的饮食起居,他只说“还行,还行”。接着他把话题岔开,说起我的同事、语言学家高更生教授:“高更生,是个,老革命呀,十几岁,就干,武工队!……”虽然气喘吁吁,可是精神头儿很好。一会儿,他的儿子、儿媳共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殷先生横坐在后座上,由儿子在前面推着,儿媳在后面扶着,慢慢地离去。旁边有人问我:“那个老头是什么人?”我说:“是山东大学的名教授。”“名教授不能向学校要一辆轿车吗?”我说:“能要,不愿意要,这就是老教授的脾气!”那人很有兴致地接着说:“听说山东大学有个老教授,很有学问,可是真人不露相,经常破衣烂衫,喜欢在学校门外的小饭铺里,喝啤酒,吃烧饼,就花生米,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位高人?”原来殷先生的趣闻已经在市井演义、流传了。

一年后,殷先生因膀胱癌去世。我从告别仪式回来,反复阅读治丧委员会印发的《殷焕先教授生平》,其中省略了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那段经历。后来读了他在晚年所写的《自叙小传》,对他在鸣放和反右中的表现深表自责。他说:“记得是罗(常培)师出国前的某一天散步时,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看你能够合群的,这让我放心。我又看出你是外柔内刚的,一旦控制不住自己,一定会替自己惹到灾难。’在1957年灾难来临时,回想先生15年前所不幸言中的话,心里总有‘知我莫如师’的感觉。”殷先生如此反省他在1957年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成分,他在追求怎样的更高人生境界呢?所谓“入党是为了争口气”云云实在太不沾边儿了。他在写墨竹的诗中有一句是“从容不迫自惊人”,也许这是他理想人格的写照吧?

(本文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梁漱溟

起来。这种情况很有代表性,很具中国特色。

“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徐贵《中国“共识”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关于理性话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波普把这种理性称为批评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真实意义是向批评开放,不断听取批评和努力自我批评。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表示的权利或地位。政治人进行对话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

(本文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唐朝田园派诗人韦应物出生于官宦世家,上数六代祖先均有位至尚书、刺史的高官,算得上是典型的“官七代”、“官八代”。他十五岁时就成为“大唐中兴之主”玄宗李隆基的贴身侍卫,鲜衣怒马出入禁中,威风显赫长伴君王,生活工作情景远非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能描画。但是,形势永远比人强,韦应物二十三岁那年,恰逢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逃奔入蜀,他也不得不下岗,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而恰恰是这漫长的生活磨难,使他真正长大了,成熟了,才开始了深深忏悔、潜心向学的生涯。

【读诗悟语】

韦应物的“忏悔诗”

□刘凤梧

此后,韦应物历任洛阳丞、京兆府功曹、户县县令、尚书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左司郎中等职,直到五十二岁,始任苏州刺史。从他的履历来看,绝大部分是在地方上任职,因此也就有了充分时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但最主要的是,经过长达三十年的学习修炼,他已经从一个放纵恣肆的富贵无赖子弟,成长为一个温柔敦厚的儒学长者。这种巨大的变化,在他那些看似淡泊宁静的山水田园诗中,也有非常艺术性的表达。例如那首为历代文人大加赞赏的《滁州西涧》一诗,就绝非仅仅表达对山水的欣赏,而正像明代诗词鉴赏大家高棅所言:“幽草而生于涧旁,君子在野,考槃之在澗也。黄鹂而鸣于深树,小人在位,巧言之如流也。潮水本急,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国家患难多也。晚来急,危国乱朝,季世未俗,如日色已晚,不复光明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宽阔之野,寂寞之滨,必有济世之才,如孤舟之横野渡者,特君相之不能用耳。”高氏能透过表面上的恬淡,体察出韦应物济世救时、关切苍生之念,实在高明。

如果韦应物只写了大量类似《滁州西涧》的诗篇,就只能置身于山水田园派诗人领军者王维、孟浩然、柳宗元之列,也恐怕难望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项背。可是,他作于苏州刺史任上的一首《逢洛开府》,便使自己成了唐代“忏悔诗人”的旗手。诗中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樽薄(赌博)局,暮窃(奸部)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官殿台阶)。驱山风雪夜,长杨(帝王官苑)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短短十二句就描画出了一个世代簪缨之家的顽劣子弟的种种无法无天,而出自顽劣子弟本人老年时代的痛切回忆,遣词造句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深深的忏悔之情。“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丞相、御史衙门)始收述(录用),南官(礼部)谬见推(破格荐举)。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惇(孤苦之人)。忽逢洛开府,论旧涕俱垂。”这几句写出了他改恶从善的心路历程,也写出了他对自行政才能的清醒认识;最后两句则生动描写了他再三再四的深深忏悔。

幸亏李隆基及早失势身亡,韦应物才能及早从肆无忌惮的行凶作恶中脱出身来;幸亏韦应物发自天良,并不是因为身陷囹圄不得已而忏悔以求宽大处理,而赢得了千年以来广大读者的谅解;更幸亏韦应物后来为官几十年清廉自守,以至于他在苏州刺史任上被免官时一贫如洗,无钱返回长安,寄居于寺庙中直至一年后身亡,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真心忏悔者的志行高洁,而赢得了千年以来广大读者的同情。

(本文为文史学者)